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传

新闻与传播学
译丛
大师经典系列

传播的偏向

[加] 哈罗德·伊尼斯 著
何道宽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Y421

传播的偏向

—加·哈罗德·伊尼斯／著 何道宽／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新闻与传播学
译丛
大师经典系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传播的偏向 / [加] 伊尼斯著; 何道宽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

ISBN 7-300-04522-7/D·750

I. 传…

II. ①伊… ②何…

III. 新闻学: 传播学

IV. G2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3692 号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

传播的偏向

[加] 哈罗德·伊尼斯 著

何道宽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239 (出版部)

010-62515351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版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12.5 插页 2

印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07 000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历来有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她在创造灿烂文明的同时，不断吸纳整个人类文明的精华，滋养、壮大和发展自己。当前，全球化使得人类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进一步加强，互动效应更为明显。以世界眼光和开放的视野，引介世界各国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沿成果，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是新中国出版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当代出版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我社历来注重对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译介工作，所出版的“经济科学译丛”、“工商管理经典译丛”等系列译丛受到社会广泛欢迎。这些译丛多侧重于西方经典性教材，本套丛书则旨在选译国外当代学术名著。所谓“当代”，我们一般指近几十年发表的著作；所谓“名著”，是指这些著作在该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并被各类文献反复引用，成为研究者的必读著作。这套丛书拟按学科划分为若干个子系列，经过不断的筛选和积累，将成为当代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成为读书人的精神殿堂。

由于所选著作距今时日较短，未经历史的充分洗炼，加之判断标准的见仁见智，以及我们选择眼光的局限，这项工作肯定难以尽如人意。我们期待着海内外学界积极参与，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深信，经过学界同仁和出版者的共同努力，这套丛书必将日臻完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

总 序

新闻与大众传播事业在现当代与日俱增的影响与地位，呼唤着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研究的相应跟进和发展。而知识的传承，学术的繁荣，思想的进步，首先需要的是丰富的思想材料的积累。“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的创设，立意在接续前辈学人传译外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经典的事业，以一定的规模为我们的学术界与思想界以及业界人士理解和借鉴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精华，提供基本的养料，以便于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作进一步的探究，而不必长期在黑暗中自行摸索。

百余年前，梁启超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自近代起，许多学人倾力于西方典籍的译译，为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建立贡献至伟。然而，由于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对年轻，如果说梁任公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那么新闻学与传播学相关典籍的译介比其他学科还要落后许多，以至于我们的学人对这些经典知之甚少。这与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很不协调，也间接造成了新闻与传播“无学”观点的盛行。

从1978年以前的情况看，虽然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在中国兴起已有半个世纪，但是专业和学术译著寥寥无几，少数中译本如卡斯珀·约斯特的《新闻学原理》和小野秀雄的同名作等还特别标注“内部批判版”的字样，让广大学子避之如鬼神。一些如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等与本学科有关的经典著作的翻译，还得益于其他学科的赐福。可以说，在经典的早期译介方面，比起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心理学等现代社会科学门类来，新闻学与传播学显然先天不足。

1978年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闻与传播教育和大众传播事业在中国如日中天。但是新闻学与传播学是舶来品，我们必须承认，到目前为止，80%的学术和思想资源不在中国，而日见人多

势众的研究队伍将 80% 以上的精力投放到虽在快速发展、但是仍处在“初级阶段”的国内新闻与大众传播事业的研究上。这两个 80% 倒置的现实，导致了学术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和学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的肤浅化、泡沫化。专业和学术著作的翻译虽然在近几年渐成气候，但是其水准、规模和系统性不足以摆脱“后天失调”的尴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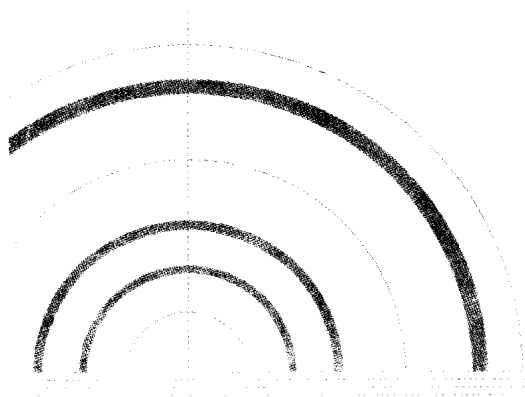
我们知道，新闻学产生于新闻实践。传播学则是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以及新闻学相互融合的产物。因此，“新闻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选择的著作，在反映新闻学研究的部分代表性成果的同时，将具有其他学科渊源的传播学早期经典作为重点。我们并不以所谓的“经验学派/批判学派”和“理论学派/务实学派”划线，而是采取观点上兼容并包、国别上多多涵盖（大致涉及美、英、德、法、加拿大、日本等国）、重在填补空白的标准，力争将 20 世纪前期和中期新闻学的开创性著作和传播学的奠基性著作推介出来，让读者去认识和关注其思想的原创性及其内涵的启迪价值。

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认为，对于文本有两种解读方式：一种是高度语境化（hypercontextualisation）的解读，另一种是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sation）的解读。前者力图从作者所处的具体社会语境中理解文本，尽可能将文本还原成作者的言说，从而领会作者的本意；后者则倾向于从解读者自身的问题关怀出发，从文本中发现可以运用于其他社会语境的思想资源。本译丛的译者采用的主要是第一种解读方式，力图通过背景介绍和详加注释，为读者从他们自身的语境出发进行第二种解读打下基础。

“译事之艰辛，惟事者知之。”从事这种恢弘、迫切而又繁难的工作，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幸赖同道和出版社大力扶持。我们自知学有不逮，力不从心，因此热忱欢迎各界读者提出批评和建议。

“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

编委会



译者序言

近年来，我致力于介绍加拿大传播学派。先后翻译出版了三本书：《理解媒介》、《麦克卢汉精粹》和《数字麦克卢汉》。麦克卢汉这位 20 世纪最具原创性的媒介理论家，已经广为人知。现在介绍伊尼斯自然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因为他们两人的名字是联在一起的。加拿大传播学派主要就是他们两个人。伊尼斯是奠基人，麦克卢汉是旗手。

一、学术地位

这个奠基人伊尼斯（1894—1952）离开我们已经 50 余年，迄今为人称颂。他留下的经典《传播的偏向》自 1951 年问世以来，已经 50 余年，至今仍然被新闻传播界奉为主臬。为什么？因为它开创了“媒介决定论”的先河，作者伊尼斯就是该学派的先驱。他的思想，经麦克卢汉发扬，成为 20 世纪最显赫的传播学流派之一。麦克卢汉传承他的思想，可以用麦克卢汉本人的话为例证。

1951年3月14日，麦克卢汉在给伊尼斯的信里说：“亲爱的伊尼斯：谢谢你重印的讲稿。这给我机会说一说对你的传播研究的兴趣。比如，《帝国与传播》里有些话似乎暗示说，有可能组织起整整一个学派。”^[1] 麦克卢汉为《传播的偏向》做序。他说：“我乐意把自己的《谷登堡星汉璀璨》看成是伊尼斯观点的注脚。”麦克卢汉的自谦，虽然有其惯用的夸张成分，但是多伦多学派这个承继关系，伊尼斯作为开山祖的地位，却是不可否认的。

麦克卢汉把伊尼斯叫做“最好的老师”。他说：

伊尼斯的著作本身是不容易读懂的。但是，只要尝试读那么一次，显然就可以知道，他是值得一读的。这样去读他，虽然会花费一些时间，但还是节省时间。他的每一句话都是一篇浓缩的专论。他的每一页书都包含了一个小小的藏书室，常常还有一个参考文献库。如果说，老师的职责是节省学生的时间，那么伊尼斯就是记录在案的最好的老师。^[2]

关于伊尼斯和麦克卢汉的先驱和继承关系，2000年《澳大利亚国际传媒》春季特刊号“重温麦克卢汉”，做了简洁明快的论述。现摘录其中的两段，予以说明：

要认识麦克卢汉，有一个问题至关重要，那就是要了解走在他前面的伊尼斯。伊尼斯确定了媒介的属性：媒介在时间和空间上对社会组织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他的研究给麦克卢汉提供了灵感。

80年代麦克卢汉声誉下降的同时，伊尼斯的地位却上升了。加拿大学界似乎常常贬低麦克卢汉，神化伊尼斯。

麦克卢汉欣赏伊尼斯那种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他把伊尼斯的求索历程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的伊尼斯纯粹是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后期的伊尼斯才成为历史哲学家、媒介理论家、传播学家。他在本书的序言里赞扬这种从“观点”转向“界面”的方法：

“后期的伊尼斯”踏上了求索变革原因的征程。写《加拿大的皮货贸易》的“早期的伊尼斯”，在很大程度上，谨守常规的只做

报导和叙述的学术模式。到了皮货贸易研究的末期，他才冒险把复杂的事件编结起来，以揭示变革的因果过程。他认为，美国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定居者和皮货商的利益冲突。这一洞见成为后期伊尼斯的典型特征。他的研究方法为之一变，他从“观点”出发的方法转到“界面”的方法，以生成洞见。

这种独特的方法是一种从叙述转向阐释的研究方法。麦克卢汉把伊尼斯和汤因比进行对照，认为汤因比只叙述不解说，伊尼斯却要寻求历史的模式、传播的模式。在本书序言里，他又说：

伊尼斯把历史当作科学实验室，当作研究形态的生命和性质的一整套受控的条件，与汤因比常规的叙述相隔千里。汤因比像体育评论员……伊尼斯却会说，运动的系统是一种有趣的感知模式。

伊尼斯本人对汤因比也进行过类似的批评。他说：“汤因比之类学者的文明研究往往有一种偏向：倚重宗教的问题，忽视空间的问题，尤其是行政和法律的问题。”

麦克卢汉认为，伊尼斯是芝加哥学派最杰出的代表。他在芝加哥大学师从西方社会学巨匠帕克（Robert Park），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麦克卢汉说：

芝加哥学派研究的是地方性社区。在挑选大型主题上，伊尼斯属于欧洲学派，而不是美国学派。实际上，伊尼斯发挥这些思想时比帕克还要走得更远。他应该是以帕克为首的芝加哥学派的最杰出的代表。

大师级的学者，必然是跨学科的奇才。伊尼斯亦不例外。其师帕克是20世纪美国社会学界的主帅，世界级的社会学家。伊尼斯本人是政治经济学家，初期专攻经济史，但是他在传播史和文明史的研究中，也独树一帜，成为多伦多传播学派的先驱。他前期的代表作聚焦于加拿大经济史，突出的有四种：《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史》，《加拿大皮货贸易》，《加拿大经济史导论》，《现代国家的政治经济》。后期的两本代表作却成为传播学的经典。这两本书是《传播的偏向》和《帝国与传播》。

二、理论贡献

伊尼斯承认自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我的许多东西都带有马克思主义的味道。不过，我努力尝试的，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解说来解释马克思。我并没有系统而严密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推向极端，也没有苦心孤诣地把它推向极端，以显示它的局限性。

他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

1. 西方文明的危机

他提出传播偏向论，是有感而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地经验告诉他，西方文明是咄咄逼人的扩展的文明。英国、德国、美国、法国等大帝帝国为了争夺资源、领土和市场，不惜血战。加拿大这样的国家感受到强大的压力。他开始潜心研究自己的国家。他放弃了芝加哥学派驾轻就熟的小社区研究路子，转而研究加拿大的宏观经济。这是为了国家的尊严和发展，为了保存、发扬和阐述加拿大的传统，为了研究加拿大的特点和国民性，为了使加拿大不依附于人，为了抗拒南边那个大国对加拿大的挤压。他认为，加拿大不应该沦为边缘，而应该经济上独立，学术上发展。

研究了加拿大经济史以后，他进一步转向更加宏大的主题。他研究文明史、传播史，寻找规律，总结教训，给西方文明敲响警钟。

他希望西方人对西方文明抱谦虚的态度：

考虑媒介对各种文明的意义，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见我们自己文明的偏向。无论如何，对我们自己文明的特征，我们可能会抱更加谦虚的态度。

1948年7月23日，在“英联邦大学研讨会”上，他指出西方文明的局限性：

我们这个主题是：“用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观点，来批判科学技术进步给现代社会带来的结构变化和道德变化”。我

请诸位自己试试看这意味着什么。首先，这个主题的表述反映了西方文明的局限性。对经济学的兴趣暗示着对专业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工作的忽视。知识的分割，显然已经到了不可能指望寻求一个共同观点的程度，各学科不可能共享同样的观点。无意间，这个会议预设了一个学问分科的观点。我们可以这样问，这个代表英联邦大学的会议，迄今为止都关心从政治的观点来表达问题，以至于忘记了西方文明一致性的问题。这是为什么？我们还可以用一般的方式来表达这个问题：西方文明已经到了这一步，这个会议的与会者，主要是大学行政领导……我们大家在这里相聚，似乎就说明西方文明出了什么问题。

他批评西方文明扰乱了时间和空间的平衡：

所谓专注于当下的执著，已经严重扰乱了时间和空间的平衡，并且给西方文明造成严重的后果。西方对时间的延续问题缺乏兴趣。这就是说，纸张和印刷术始终对空间感兴趣。国家感兴趣的始终是领土的扩展，是将文化同一性强加于人民。失去对时间的把握之后，国家请愿诉诸于战争，以实现自己眼前的目标。

2. 文明分期

他按照媒介对文明进行扫描和分期。他认为文明有这样的特质：

文化在时间上延续并在空间上延展。一切文化都要反映出自己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影响。它们的覆盖面有多大？在时间上延续了多久？文化在时间上的局限，盖源于它不能调动一个民族的思想资源，至少这是原因之一；盖源于它不能把思想资源用来避免停滞不前和厌烦情绪。厌烦和停滞的历史还没有人写。

他按照传播媒介的形态和性质对世界文明作了这样的分期：1) 苏美尔文明；2) 埃及文明；3) 希腊—罗马文明；4) 中世纪时期文明；5) 中国纸笔时期文明；6) 印刷术初期文明；7) 启蒙时期文明；8) 机器印刷时期的文明；9) 电影时期的文明；10) 广播时期的文明。他说：

我这篇讲话按传播媒介将世界史分为以下几个时期：从两河流

域苏美尔文明开始到泥版、硬笔和楔形文字时期；从埃及的莎草纸、软笔、象形文字和僧侣阶级到希腊—罗马时期；从苇管笔和字母表到帝国在西方退却的时期；从羊皮纸和羽毛笔到 10 世纪或中世纪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羽毛笔和纸的使用相互交叠，随着印刷术的发明，纸的应用更为重要；印刷术发明之前中国使用纸、毛笔和欧洲使用纸、羽毛笔的时期；从手工方法使用纸和印刷术到 19 世纪初这个时期，也就是宗教改革到法国启蒙运动的时期；从 19 世纪初的机制纸和动力印刷机到 19 世纪后半叶木浆造纸的时期；电影发展的赛璐珞时期；最后是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现在的电台广播时期。

3. 传播偏向论

伊尼斯认为，传播和传播媒介都有偏向，大体上分为：口头传播的偏向与书面传播的偏向、时间的偏向与空间的偏向。

他发现，媒介可以分为两大类，两者有一个基本的区别：有利于空间上延伸的媒介和有利于时间上延续是媒介。比如，石刻文字和泥板文字耐久，所以它们承载的文字具有永恒的性质。但是，它们不容易运输，不容易生产，不容易使用。相反，莎草纸和纸张轻巧，容易运输，方便使用，能够远距离传播信息，然而它们传播的信息局限于当下，比较短暂。

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这种偏向或有利于时间观念，或有利于空间观念。

根据传播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它也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的时候。所谓媒介或倚重时间或倚重空间，其涵义是：对于它所在的文化，它的重要性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向。

他列举了历史上的许多例子，说明口头和耳朵的传播受时间束缚，眼睛、文字、书面的传播受空间的束缚。

他推崇口头传统，尤其是古希腊的口头传统，认为该传统达到了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相互平衡的理想境界。他认为，这样的平衡境界可以

给当代的西方文明以非常有益的启示。所以他说：

希腊口头传统中产生的荷马史诗，表现出对空间问题的强调……口头传统的灵活性，使希腊人在城邦体制下求得了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的平衡。

我偏向于口头传统，尤其是希腊文明中反映出来的口头传统。我认为有必要重新把握其神韵。为此目的，我们应该弄懂那种对生活（或者生活传统）重要的东西，或者说对活生生的传统重要的东西。这些重要的东西，是口头传统独特的东西，是和机械化传统相悖的东西。我们就应该弄懂，希腊文明有什么贡献。

他惋惜口头传统的衰落，因为口头传统既倚重时间媒介（如文字），又倚重空间媒介（如金字塔、雕塑）。所以他说：

口头传统之式微，意味着对文字的倚重（因而倚重眼睛而不是耳朵），意味着对视觉艺术、建筑、雕塑和绘画的倚重（因而倚重空间而不是时间）。时间的重要性之经久不衰，表现在建筑和雕塑使用的物质材料之中，这些物质材料的性质经久不衰，石料的性质尤其如此。

他惋惜向书面传统的回归，所以他说：“15世纪中叶印刷术的发现，意味着一个回归的开始。我们又回归于眼睛占支配地位的文明，而不是耳朵占支配地位的文明。”和印刷术一样，摄影术也是“视觉本位的传播。这种传播产生的垄断，给西方文明构成毁灭性威胁，先是战争的威胁，后是和平的威胁。这种垄断强调个人主义，随后又突出非稳定性。它造成了民主、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等标语口号的幻觉”。

像麦克卢汉一样，他认为西方文明从拼音文字开始到广播媒介为止，走了一段弯路。这段弯路，就是专门化，就是“太过”。首先他推崇希腊文明的“勿过”：

“万事勿过”（Nothing over-much）是希腊人的至理箴言，其暗示意义是不信赖专门化的技艺，在一切文化生活领域里都是如此。到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由于文字和个人主义的发展，希腊文化被毁了。

接着，他批评西方文明的“太过”。他说：

对专门化和“过”的关注，使我们无法理解那些关心平衡与比例的文明，妨碍我们理解这些文明。工业主义就是关注技术，就意味着把时间切分成精确的段落，以满足工程师和会计师的需要。如果不能逃避工业主义对时间的要求，我们评价空间局限的能力就会削弱。

4. “媒介对社会的影响”

他认为，媒介的形态对社会形态、社会心理都产生深重的影响。在这一点上，他和麦克卢汉异曲同工。他说：

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

广播电台使西方文明史进入一个新阶段，它倚重的是集中化，它需要关注的是连续性。

喇叭和广播的使用促成了希特勒的上台。借助口语，他可以诉求于人数少的群体和民族……和印刷工业的需求相关的政治边界，在这个新的传播媒介面前已经不复存在。在利用民族主义方面，口语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础，它可以诉诸于更多的人，是一个更加有效的工具。文盲状况不再是严重的障碍。

纸在中国的大量供应，使佛教徒能够大规模发展雕版印刷……中国的文字给行政管理提供了基础，它强调的是按照空间来组织帝国，不足以满足时间的要求，因此中国总是暴露出改朝换代的问题。

纸引起了极端重要的……一场革命，没有纸，就不会有这么多人去从事写作的艺术，印刷术对人类的贡献也将大大逊色……纸使我们能够用一种普世的物质去代替昔日传递思想的昂贵材料，它促进了人类思想成果的传播。

他在这方面的论述，仅见于本书的，就有上百条，难以一一列举。请读者慢慢欣赏。

三、思想遗产

1994年,伊尼斯百年诞辰之际,多伦多大学和几所大学联手,隆重纪念加拿大这位学术泰斗。凑巧在这一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加拿大学界在成熟的信息社会里、在数字时代的门槛上,重温伊尼斯的思想遗产。这次纪念的主要成果陆续问世,笔者已经见到有三本书,一本特刊。第一本是《教育技术棱镜下的伊尼斯》^[3],全面检讨伊尼斯的学术思想。第二本是《伊尼斯在新世纪》^[4]。第三本是传记:《伊尼斯画像》^[5]。特刊是《加拿大传播学季刊》1998年第一期,题名“伊尼斯百年诞辰纪念专集”。他的思想遗产,还见诸以他命名的基金会、学院、网站之中。

兹将他的思想遗产略加梳理,简单概括如下:

他从研究加拿大本土的贸易、运输和交通网着手,自成一家,对加拿大经济史研究作出卓越的贡献,使加拿大的经济学研究摆脱对西方大国的依附,走向独立与辉煌。

他首创“大宗初级产品论”,研究加拿大的皮货、纸张、采矿业、木材业、渔业、谷物、石油等产业,给加拿大人敲响警钟:加拿大不能满足于初级产品的生产,经济不能受制于人。加拿大人必须弘扬自己独特的国民性,文化上也不能受制于人,不能成为英美等国的边缘,不能受文化帝国主义的挤压。

他的媒介“偏向论”似乎着重研究世界文化史、传播史。其实,他主要的着眼点还是强烈的现实关怀。他希望给偏重空间扩张的西方文明敲响警钟。这个思想对社会的权力、文化和价值都产生深刻的影响。

他认为,媒介的偏向和强大影响,不等于媒介具有决定性;媒介的作用仅限于“加速”、“促进”或“推动”复杂的社会进程。他认为影响社会进程的还有其他许多因素。由此观之,后人给他和麦克卢汉强加的帽子“媒介决定论”,未必是妥当的。

主导媒介的时间偏向表现在它对文化和制度产生的影响。倚重时间媒介的文明固守传统,强调连续性,突出社会的黏合力,紧守神圣的信仰和道德传统。相反,所谓空间偏向的文明是:强调地域扩张,强调中心对边缘的控制,世俗制度发达,宗教体制薄弱,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社区生活逐渐瓦解,甚至衰亡,个人主义盛行。他研究人类历史的几十种文明,其实是要寻找克服西方文明危机的救世良方。

主导媒介造成的知识垄断，使知识和权力集中在富裕的权势集团手中。要避免知识垄断才能避免文明的危机。

他对加拿大的文化政策和教育政策，多有进言，发表过许多精彩的意见。本书英文版的两个附录主要就是这两个问题。限于篇幅，此处不赘。本书的主题是传播的偏向和媒介的偏向，两个附录似乎游离于这个主题之外。中译本有意识地省略之，相信读者能够理解。特此说明。

何道宽

2003年4月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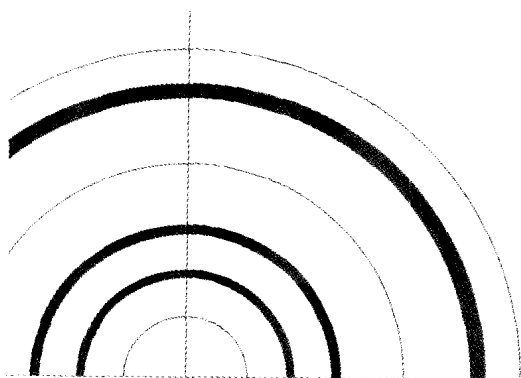
【注释】

[1] [2] 《麦克卢汉精粹》，114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 *Harold Innis Through the Lens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Glenn Clark,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 April, 2000.

[4] *Harold Innis in the New Century: Reflections and Refractions*, ed. Charles R. Acland et. 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5] *Harold Adams Innis: Portrait of a Scholar*, Creighton, Donald G.,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9.



麦克卢汉序言

对那些对波德莱尔以来的诗歌和塞尚以来的绘画略知一二的人而言，哈罗德·伊尼斯后期的世界都是一目了然的。他用电力时代诗歌绘画中的当代意识，组织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数据资料。他从未染指现代艺术和诗歌，然而他发现了自己的洞见组成的颇像当代艺术形式的模式。他推出的洞见，呈现马赛克结构。这些结构，似乎是由毫不搭界的比例失调的句子和警句组成的。比如 108 页就很耐读，它的一个脚注就很有学问。凡是查检过他的参考文献的人，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能够从枯燥的并列中抽取出令人兴奋的事实。他仿佛在用一个“盖达尔”计数器去探索资料。反过来，他的探索结果，用的是一种洞见的模式，其包装是不适合消费者口味的。他期待读者去完成他忽略了的一个又一个发现。他认为，我们的大学搞知识分割肢解的专门化，是不光彩的知识垄断（109 页）：“最后，我们必须记住，大学的作用是有限的，我们要记住这句话：‘科学的整个外部历史，就是学者和大学抵抗知识进步的历史。’”